

百岁老人的风雨人生



俞谐抱着一个牛皮纸袋，走在熙熙攘攘的东门大街上。这个25岁的农村青年平时很少进城，他在这条宁波最繁华的街道走了几个来回，犹豫着转进一条小巷，终于在迎面的墙壁上，看到了一个大大的“当”字，悬在半空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

那是1939年初，日军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宁波，俞谐有一个去江西吉安参军报国的机会，但是凑不足路费，思来想去，只有把家里最值钱的那条法兰绒裤子当掉。

他如愿当了1元6毛，这笔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他想过赎回这条裤子，只是再回到东门大街，已是一个甲子以后的事了。

上个月，102岁的俞谐在美国病逝，他把3000美元的善款和多年前建立的一个基金会留给了家乡，同时留给长子俞舜民一本叫做《雪泥》的回忆录。

开头是苏东坡的诗：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……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作者俞方栢（99岁）与老伴程芝苓（93岁） 2012年摄

俞方栢（右）和老伴的合影。（翻拍）（俞方栢是俞谐另一个名字）



儿子俞舜民向记者讲述父亲的故事。



父亲写给儿子的信。

“3个月就能回来了”

俞谐原来不叫俞谐，本名俞方栢，乳名俞纪良。1914年出生在黄古林俞家村的他家境贫寒，才上了两年初中就不得不辍学回家，找了份小学代课教员的职业挣钱养家。

“七七事变”的那一年，他正被肺病折磨，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，所幸后来被哥哥接到南京治疗。随着战事的逼近，大病初愈的他又匆匆回乡，在当时的鄞县东乡做代课老师。

炮火之中，“蓬门陋巷，教几个小小蒙童”的朴素愿望难以继，上阵杀敌成为所有热血男儿的愿望。1938年，从淞沪战场上撤下的国军一九四师政治部宣传队驻在宁波。

俞纪良想去参加宣传队，但学历不够。在江东一所中学教书的哥哥从毕业生的花名册中，找到了一名病故的高中学生“俞谐”，让他借用这个名字，进了宣传队。

俞谐这个名字，从此跟了他一生。

第二年，俞谐就有了一个去吉安参加战时干部训练团培训6个月的机会，只是家徒四壁，父亲又年迈多病，他万般纠结。

自从母亲去世以后，父亲苍老了很多，他几次想开口，却又把话咽了下去。有天晚上，

父亲多喝了几杯，红光满面。俞谐趁他心情不错，说了自己的想法，只是把6个月改成了3个月。父亲爽朗地挥挥手，“你去好了”。

为了凑足路费，他咬咬牙，当了最喜欢的一条裤子。

根据回忆录里的描述，那是一条在旧货摊买来的法兰绒西裤，质地好，花色也好，很少穿，连裤缝都没有走样。

当时想着，等抗战结束，说不定还能赎回来。他憧憬着，赶走了鬼子，他和父亲、妻儿，一定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

“3个月就回来啦”，俞谐上路，和家人平常告别。辛苦操劳的妻子，年幼的儿子，还有年迈的父亲，把他送到大门口，望着他走过村东头的仙圣桥，走向祠堂河埠。

他绕到母亲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坐上了离家的小木船。

3个月过去了，6个月过去了，他没有回来，年迈的父亲在等待和思念中耗尽了生命。

一直到抗战结束，长子俞舜民才等来父亲的一封信，得知抗战艰难，父亲历尽劫难九死一生，非常想家，只是战后百废待兴，一时

还难以抽身。

等待了多年的发妻，含着泪说了一句：“人在，就好”，然后接着等。

俞舜民在父亲陆陆续续的来信中知道，父亲黄埔军校毕业后，出任江西南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，后来又去了上海，在那里平抑物价。

1948年春，在离家10年后，俞谐回了一次家，住了10多天后又离开。

他回头望了一眼家乡：如带的群山淡淡地萦绕在西边的地平线上，广阔碧绿的田野之上散落着三三两两的村庄，一条大河从远处的四明山蜿蜒流来，一直流到当时号称鄞西巨镇的黄古林，村头河边一棵大树，年年开花……

之后的半个世纪，这一切只能在梦里相见。

1985年，俞谐从台湾乘坐飞机到香港和儿子相见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，机上半睡半醒间，家乡的点点滴滴，在脑海中若隐若现：

“牌楼弄前的那座石凳还在吗？南河的那棵大树还开花吗？咸昌门上的匾额，娘娘庙的石桥，黄古林的万顺祥……”

“回头窗外，风雨未停”

么，他在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话：“回头窗外，风雨未停。”

他这一走，家里的事情从此一无所知。他不知道儿子俞舜民考上了宁波中学，那一年的国文考题并没有文字，试卷上方画了一艘风雨飘摇的海轮。年轻的俞舜民把海轮比喻成战乱中的中国，风浪比喻成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形势，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中国将何去何从？如果做题的是他自己，会不会联想到时代浪潮中个人不由自主的命运？

俞谐的人生，在那个台风甚多的荒凉岛屿重新开始。

到台湾后，他又有了新的家庭。

这个当初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的年轻人，奋发图强，1953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台北工专及私立淡江英专教授，后来成为台南家政专科、高雄医学院、中央医学院董事，1964年赴美攻读教育硕士，回台湾后又应聘为台湾师范大学、台湾大学教授，教书育人，著书立说。

俞谐当时也不知道，自己读书的时候，儿子俞舜民却因为受其牵连，生活异常艰难。

1948年5月，俞谐离家的时候，是先坐轮船到上海，再搭火车赴江西任贵溪县县长。

那一年，俞舜民13岁。望着父亲上船远去的背影，他心里充满了忧伤。

兵荒马乱的时代，生离死别往往发生在车站、码头——上了船，就是一生。

俞谐上一次离开，是和父亲的永别；这一次，是和发妻。

他出发前曾和妻子说，等时局稳定就回来。但他又食言了，第二年因为时局变化，他去了台湾。

在俞谐的回忆录里，他是1949年9月去的台湾。那天深夜，他们的船遭遇了台风，在浪中剧烈颠簸，太平轮的阴影笼罩着船上的每一个人，最近的港口在汕头，可是他们不敢去那里暂避，只能开足马力迎难而上……

船上每个人都不出声，身后的家乡已被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，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汪洋大海，“风雨飘零，倍感凄怆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船终于缓缓始入基隆港，人人额手相庆，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俞谐在想什

很多年后，当年的场景依然一次次出现在俞舜民的噩梦中——阶梯教室挤满了人，他被架在前排众，接受批判；他被剥夺了好多权利，被罚到农场去拉大粪车；他积劳成疾，身患伤寒，被扔到医院，高烧不止，昏迷七天七夜，医生在他身上放满了冰袋，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……

所有的屈辱和磨难，都来自那个13岁就弃他而去下落不明的父亲。

俞舜民恨他。
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沉冤昭雪，他的人生才迎来了新的起点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接到了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来信，有了父亲的消息。

1983年，弟弟邀请他去美国，他知道那是父亲的意思。那一年老人70岁了，是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到这个长子。

俞舜民心里五味杂陈。

千头万绪，无从说起。落到笔下，是孟郊的那首《古怨别》：“心曲千万端，悲来却难说。别后唯所思，天涯共明月。”